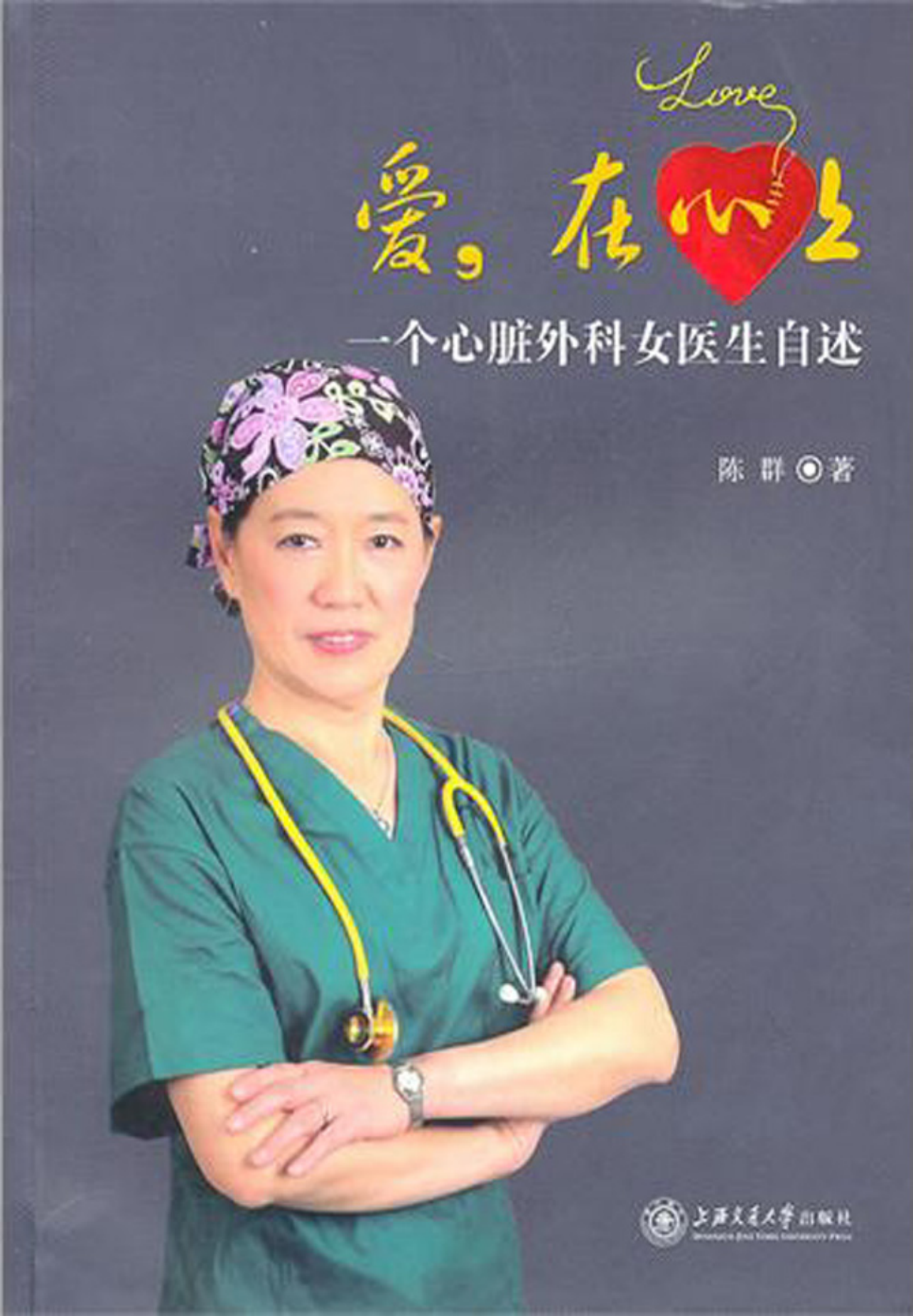
爱，在心上

Love

一个心脏外科女医生自述

陈群◉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爱，在心上

——一个心脏外科女医生自述

陈　群　著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一个心脏外科女医生的个人传记,是作者对自己从医近 40 年的人生回顾。书稿将作者个人的人生经历放在中国的时代大背景下,体现了作者个人的成长、奋斗与国家命运的紧密关联。全书分 8 个部分,按时间顺序对作者的奋斗历程作了回顾,其中既有想做医生而不能的失意与苦闷,也有在政府机关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真切写照;既有时代背景激荡下的人生转折,也有在转折中的彷徨与思考;既有 20 世纪 80 年代在艰苦环境下的探索与奋斗,也有在国外学习与工作的新奇与紧张;既有对作为一名心脏外科医生艰辛与压力的真切坦露,也有对生命的敬畏与庄严承诺;既有对事业有成、独当一面的描述与自豪,也有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国外同行交流的心得和感受。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可从中窥见一个心脏外科女医生的成长历程及医德医术,也能见证中国近 40 年的发展与变化,值得年轻人,特别是青年医务工作者一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在心上:一个心脏外科女医生自述/陈群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313-06769-2

Ⅰ. 爱... Ⅱ. 陈... Ⅲ. 陈群—自传 Ⅳ. K8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5582 号

爱,在心上

——一个心脏外科女医生自述

陈 群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韩建民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 × 960mm 1/16 印张:17.75 插页:4 字数:280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 230

ISBN 978-7-313-06769-2/K 定价: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王小鹰

我跟陈群医生素昧平生，经人介绍，她的文稿辗转到了我的书桌上。记得当时我正在给《长街行》收尾。我还是抽暇看了她的文字，确实感动了我，不是以她文字结构的技巧，而是以她真诚坦率的叙述，以及她的人生经验给予我们的启迪。

由此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是关于文学的本质问题，我们笔下的文字（对于大多数现代人来说，是手指敲击下的文字）究竟为什么而书写成文？说得更简单明了些，便是为什么而写作？汉代杨雄曾说："言，心声也；书，心通也。"刘勰《文心雕龙》中道："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两位古代文论家都提到了"心"，原来文学的本质便是由心而起，心有所向往，才托形于文字。

陈群的经历非常跌宕，在任何磨难面前她从不气馁，从不放弃。她生活得勇敢、真诚，而且智慧。当她回味自己的人生，品咂世态百象，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自己的心声，并且名之为"爱，在心上"，故而她的文字是纯粹的，是脱离低级趣味的，故而一定是感人的。

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那样的丰富、驳杂、曲折、坎坷，就像陈群一样。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作家，都可以写出让人感动的文字。只是，这样的书写，必须是真真切切地从你的心里流淌出来。

2010年5月

于沪上

目录



第一章　偶然的转折(1970～1972) …… 1

1. 红色浪潮中成为一名医生 …… 1
2. 当妈妈与做医生同时开始 …… 11

第二章　修补病人的心脏(1972～1983) …… 19

1. 心脏外科病房 …… 19
2. 真是美妙无比的职业 …… 20
3. 掉进了知识的海洋 …… 28
4. 摘掉外语文盲的帽子 …… 37
5. 唐山大地震,接生了一个叫“震生”的孩子 …… 40
6. 人生的冬天 …… 47
7. 一家两个心脏病孩子 …… 48
8. 发绀孩子的命运 …… 62

第三章　陋室岁月(1980～1984) …… 78

1. 考上了研究生 …… 78
2. 12 平方米的家 …… 81
3. 绿色的逗号 …… 85
4. 在准备出国的日子里 …… 90

第四章　难忘澳洲的阳光(1984～1986) …… 93

1. 一个陌生的世界 …… 93
2. 圣文森医院的住院总医生 …… 98
3. 皇家儿童医院的训练 …… 123
4. 悉尼、换心病人和张仁谦医生 …… 132
5. 我成了皇后维多利亚医疗中心的病人 …… 141
6. 奥斯汀医院的雨声 …… 150

第五章　担负起生命的沉重(1986～1996) …… 153

1. 为了病人必须这样 …… 153

2. 走进复杂先天性心脏病之门 …… 161
3. 心脏里有颗子弹的山东男孩 …… 178
4. 我不能听那哭声 …… 180
5. 爱心的呼唤 …… 185

第六章　掌声响起来(1989～1997) …… 190

1. 在曼谷,第一次走上世界讲坛 …… 190
2. 日本国际会议的挑战 …… 195
3. 评上了“十佳”医生 …… 199
4. 初次访美的脚步 …… 203
5. 经历欧洲 …… 207
6. 1995 年 8 月的北京怀柔 …… 214
7. 小儿心脏外科成立 …… 219

第七章　生命的礼物(1997～2008) …… 221

1. 在夹缝中求生存 …… 221
2. 成功揭开爱心手术的序幕 …… 227
3. 寻找需要帮助的孩子 …… 235
4. 江西的 20 个孩子 …… 241
5. 维多利亚和第 100 例病儿 …… 249
6. 两个朝鲜儿童 …… 252
7. 克莉斯汀和“心连心”俱乐部 …… 257
8. 共同捧起生命的礼物 …… 262

第八章　新的一页(2004～　) …… 269

1. 退而未休 …… 269
2. 新的憧憬 …… 278

后记 …… 279

第一章　偶然的转折

1970～1972

1. 红色浪潮中成为一名医生

1966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文化大革命震惊世界，它改变了整个中国和每个中国人的命运，这场灾难造成的负面影响难以估量，历史已向人们做了回答，并将继续见证它一切的一切。

没有想到这场红色风暴将我从上海市卫生局机关席卷到上海某专科医院，从一名坐办公室的小职员变为站在无影灯下、操持手术刀、为病人修补心脏的外科医生，这一站就是近40年。

1943年12月，我出生在上海法租界南区的一个名为“花园弄”的小弄堂里。这条由一排将近20座矮平房毗邻而成的弄堂里住着几十户人家，大多数是来自苏州、苏北的“移民”。做着小生意，如开成衣铺、挑馄饨担、卖花、拉黄包车、踏三轮车，还有做巡捕（警察）的，有一家是靠做二房东过日子，真像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里的人们居住结构。我爸爸在经过一段学生意阶段后，自己开起了夫妻老婆店，当时我的家境在“花园弄”是首屈一指的。

我妈妈患过肺结核，成年累月吃药打针，可能自己多病，妈妈对我和妹妹就寄予期望，希望我长大了当一名医生，妹妹做个药剂师。但是我自幼胆子很小，半夜里听到床底下老鼠叫，会吓得用被子蒙住头不敢入睡，看到厨房里穿过蟑螂会害怕得哇哇叫。我想长大了不可能当医生实现妈妈的愿望。

我喜欢当老师。还在读小学时，经常召集五六个比我年龄小的孩子来我家客堂上



4 岁时与父母在城隍庙照相馆留念

课。我要他们看着我在小黑板上写粉笔字跟我朗读，布置他们做课堂作业，之后在作业本上用红笔打钩记分，圈出订正部分为他们修改。我想长大了要当名老师，授教他人，为人师表，受人尊重。

我还曾经想当个演员。我从小就经常跟着妈妈和她的小姐妹去戏院看戏。有时去大的剧场如黄金大戏院（后来的大众剧场）看越剧十姐妹演出的《山河恋》，有时去附近小戏院，如同乐剧场（后来的雅庐书场）看小剧团演出，还跟了她们去大世界看锡剧、沪剧，只要花两角钱买张票，就可在里面看日夜两场戏，很过瘾。

渐渐地，我喜欢上了越剧，从喜欢看到喜欢学、唱、做。记得小学毕业时，我父母带我和妹妹乘了三轮车到贵州路摩登照相馆，一位有经验的化妆师十分用心地化了一个多小时给我俩脸上上了油彩浓妆，拍了两张宝玉和黛玉的剧照，看着镜子里化了妆的自己，我觉得太美了。现在，事过半个世纪的这张剧照还保留着鲜艳的色彩，真敬佩照相馆师傅的手艺。这张老照片记载着我儿时对越剧的热爱，也保存着我父母对我们的爱。

从那时起，到了寒暑假里，我就与弄堂里小姐妹一起唱戏做戏，找出家里的绸被面，披在身上，当做戏衣水袖，后来竟然在弄堂里空地上搭起戏台，上演《十八相送》、《楼台会》，引来不少人看热闹。

上中学后，我将妈妈每月给我的几角零用钱节省下来看越剧，我成了剧场最后几排的老观众。记得上海越剧院在人民大舞台演出《红楼梦》时，我曾带了一个小凳子在天蒙蒙亮时到这个市中心剧场，排在长龙队里，买戏票，那时我才不到 15 岁。

我在初中 3 年期间，曾参加学校的越剧文艺组，后又考进了上海学生课余文工团。与我在女子中学同班的徐同学，是我校越剧文艺组最好的“演员”之一，初中毕业那年，

因为听说越剧院要招演员，于是我们相约去位于复兴西路的上海越剧院。在那里，徐同学接受了有关人员的面试，看着她是铁了心要唱戏，我是欲言而又止，毕竟我没有她那样有做演员的天分。



12 岁时的戏照——宝玉与黛玉（左一为妹妹，右一为作者）

初三毕业后，徐同学真的进了上海越剧院，而我，在一群同学煽动下，考进了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护士学校。进了医院圈子，与“白衣天使”沾上边、挂起了钩。

护士学校位于广慈医院内的思南路后门口，是全日制寄宿学校，宿舍就在复兴中路口的思南路 41 号那幢红色小洋房里。护士学校是三年制，第一、二年在学校上课，第三年在医院的各科室轮转实习。

记得刚开始下病房见习时，我们这群十六七岁的花季少女，看到高年级的同学十分羡慕，她们穿上白色制服、戴上白帽、口罩，修长的双脚穿上长筒白袜、白鞋，好一个一身全白，只露出一双微笑着却带着关注的眼睛，在安静的病房里进进出出，充满自豪感，那种神圣而又高尚的职业感，在她们身上洋溢着。

我们跟在高年级同学的后面，早晨推着病历车、换药车，跟随医生查房，下午给病人测量体温、发药、打针。我最怕给病人打针时不能一针见血，即使病人不叫，心里也怪难受的；还怕发错药，所以“三查三对”是万万不能疏忽的。最使人感到拘谨的是每天早晨病房的晨会，站满一室的医生、护士倾听夜班值班医生、护士的交班，并讨论一些特殊病例的医疗事务，我们护生只能胆怯地缩在房间的角落，不敢发一点声音。我不时地拉自己的帽子，生怕前额的头发露出来，不时地检查自己的袖口，看扣子有没有扣好，要是被护士长发现肯定要挨批。护士长在病室里是最大的，她们管一切事，可以批评任何人，即使是医生、主任都要买她几分账，何况是我们护生呢。那时，在我印象中，医学院的实习医生也是挺神气的，对我们而言，他们都是凌驾于我们之上的。

在护士学校住宿就读的岁月里，正值我们国家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历史时期。当时口号是“15 年里赶上英国佬”。全民上下为大炼钢铁出力，城市居民们家家捐铁锅、铁勺子等一切铁具。农村里，农民土地公有化，“吃饭不要钱，人民公社是我家”。我跟随着医学院的四、五年级大学生组成的下厂小分队赴闵行上海电机厂两周，为工人兄弟们防病治病服务，为大跃进出力。我被安排在小分队的宣传组，上午写写医药科普稿，中午在厂广播室里向就餐用膳的工人们宣传健康卫生知识，下午出黑板报、墙报。

从厂里回来不久，护士学校又组织我们同学下农村，因为农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正搞得如火如荼，农民种集体化的田、吃公社食堂的饭，共产主义似乎就在眼前。我们与医学院学生一起去莘庄人民公社，任务是“讲卫生、除四害”，为农村防病治病服务。消灭蚊子、麻雀是那次下乡“讲卫生、除四害”的主攻目标。白天我们在田里扎起一个个稻草人，以惊吓田野上飞过的麻雀，晚上在田埂头点燃起草堆，敲起铜锣，大声叫喊，让麻雀不敢停留，一直飞到累死倒下。我们每个人还手里拿着一个涂满了肥皂泡沫的面盆，向空中挥舞，以图网罗飞蚊。因此，黄昏后的农村田头成了我们与“四害”作斗争的战场，响亮的铜锣声，众人的吼叫声，伴随着草堆的火光，其气势浩荡，群情激奋，无愧于那个高举三面红旗、轰轰烈烈的历史时代。

那年头，我们还常常组织文艺小分队到街头、工厂、田头宣传，歌唱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万岁”。我常常负责编快板，演说唱，编排的节目都是应和社会主流、政治口号之类的，如演唱越剧“全民奋起为钢战，祖国大地放红光”，快板“人民公社就是我的家”。印象最深刻的是著名评弹演员徐丽仙唱的一首“六十年代第一春”弹词，成了我们文艺小分队演出的重档节目。该曲中有一段唱词：“党叫我们到那里去，我们就向那里奔，党叫我们上天去，我们就冲向云霄摘星星，党叫我们下海去，我们就海底捞起绣花针……”鲜明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政治信仰和思想情感，党、国家、集体，始终是第一位的。

1960 年暑假，我们进入第三年临床实习，一天我们被告知当年医学院校招生名额未满，有关领导部门决定挑选一批护生上大学。眼看就要进入临床实习，毕业后就可成为国家工作人员了，现在出了一个新方向，要我选择，好不心烦。但想到将来能当一

名医生，可以了却妈妈希望我成为治病救人医生的心愿，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经过家里的商量，我报名参加了这支进高校的考试队伍，最终录取 10 名，我是其中一个。于是，我们 10 个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护士学校的二年级护生成了上海医学专科学校 60 届的学生。

坐落在南京西路的上海医学专科学校是上海市卫生局主办的三年制大专院校，医疗教学隶属于上海第二医学院，师资力量都来自那里，据说这个学校的诞生是为了对五年制医学院教育体制的一种补充，目的是加速医生人才培养，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



大学时代（1962 年 2 月）

我记得自己是年级里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之一，尤其是解剖学、病理学成绩出色。为此我被选为班里解剖课代表，每次考试前，我总带领同学在病理解剖室点拨着一具具经药液固定处理过的尸体，内脏器官，尽管那药味刺激难忍，引起流泪、咳嗽，但我不厌其烦给一批批同学讲解、辅导。对哪块肌肉起始于哪根骨头，止于何处，哪根神经穿过哪个孔，如何行走，分布何方背得滚瓜烂熟。由于我肯帮助人，老师和同学都很喜欢我。到了二年级后，我被选上了学校的学生会副主席和团委书记，社会工作多起来了，经常要参加一些会议，与老师接触，与同学沟通，还要组织一些校内活动，如学习竞赛、体育比赛、文艺会演等。有一次全校文艺会演，我们班上排演了话剧《江姐》（狱中片断）和沪剧《星星之火》（母女隔墙对唱），我主演其中小珍子，凄惨的唱腔和逼真的表情赢得观众同情的泪水和热烈掌声，还获演出奖。

转眼就到了第三年，我们告别了学校生活，踏进了医院开始临床实习了。我们班组被安排在北京西路上的市第六人民医院。当起了实习医生，穿上了白大掛，在人前背后是够神气的。当时医院的管理很严格，各级人员职责分明，在病房里受上级医生管理，还要受护士长和护士指点，可以说是病房里的小字辈，万事得抢着做。但不管怎

样，在病家面前总是医生，从他们的眼神和语气中无不伴随着对你的尊重和信任。就从那时候起，当我一穿上白大掛，一种神圣的职业崇高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至今犹存。

一个星期日，轮到我在外科病房值班，那天床位上有一个70多岁的老妇人，直肠癌手术后继发多种并发症，昏迷病危。整整一天，我守候在她床边，听血压、数脉搏、看呼吸、写记录，还要不停地走进走出，向上级医生汇报，向家属告知，并不断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医生，我妈妈现在情况如何？""会好吗？""有希望吗？"。那天我两个耳孔都因听诊器的频繁使用而疼痛，脚上穿着那双妈妈的半高跟鞋差点断了跟，崴了脚。是夜病人情况恶化，我更不敢离开，坐床边履行职责，忍不住打起盹来，差点一头扑在病人的耳旁。随着老太太深而长的临终呼吸，我目睹着她的生命一点一点远去，最后我给她送了终，在家属们的号啕哭声送走了裹着白布的老太太身躯。

这一整天24小时的值班情景令人难忘，那是我第一次如此深刻感受到医生这个名字的含义。医生是与死神作斗争的勇士，是守护病人生命的卫士，是病家心目中的天使、救世主。医生的职责确实崇高、伟大，但更多的是沉重和奉献。

命运之神总是要我"急转弯"。1963年7月我们这一届学生毕业，我被通知去市卫生局计划生育办公室工作，"坐机关，不当医生"。我愣住了，我压根儿就没想到过，但在那个年代，一切听从组织决定似乎成了每个人的行动准则，我服从领导的分配，马上到市卫生局计划生育办公室报到，成了机关工作人员。

1963年夏天，我离开校门走进了机关。新成立的上海计划生育办公室位于汉口路市府大厦内，主管全市的计划生育、晚婚工作，宣传并落实党中央有关政策和医疗措施，如节育手术、避孕药物、工具等。这对我这样一个尚未婚配谈朋友的姑娘来讲，搞这一行当确实不太相配。做一行就得爱一行、像一行，似乎是我与生俱来的品性。我跟随年长的同志下基层、去农村，经常长途跋涉，住宿在外。每到一处，听取基层人员的汇报，向农民宣传一个家庭生一个孩子，动员多子女家庭的育龄夫妇采取节育措施，做婚龄青年思想工作，推迟结婚。同时，向她们传达中央或市委的最新文件精神，介绍兄弟区县的经验。后来，有的乡村出现了搞竞赛、搞突击运动和强迫命令等现象，我们的工作重点就转向了如何保证党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正确轨道上健康发展，于是频繁下

基层、农村，发现问题撰写材料上报领导，予以纠正。此外还不断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听取他们呼声，联络有关部门，寻求解决途径。我完全进入了一个国家机关干部的角色。

这段坐机关经历带给我的见识和锻炼，对我日后人生受益匪浅，不仅是行政能力方面得到训练，包括写作能力、沟通能力、组织能力等，而且加速了我在政策观念、是非观、责任感和认知、自律等方面的思维、品行得以形成。

1964 年秋天，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四清”运动。“四清”是指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阶级队伍。我们机关抽调了不少人员到“四清”工作队下基层搞运动，我被抽调到上海冶金局“四清”工作队，到其下属的某钢铁厂。

该钢铁厂位于普陀区长风公园附近，是一家拥有1000 多工人的中型钢铁厂。我家住在市区南面，每天上下班要换乘 3 辆公交车纵贯大半个上海市。工作队带队的是上海市冶金局的一位副局级干部，我分在工作队的车间组工作，任务是下车间与工人同劳动，寻找好的根子，即可以依靠的工人阶级分子，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揭发厂内干部的政治、经济、生活问题，以发现潜在的“阶级敌人”，顺藤摸瓜挖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每天清晨，换上劳动服、戴上工作帽、穿了工作鞋，颈项上兜上一条毛巾，走向车间，我曾轮流地在该车间的木工组、车床组劳动，叫每个工人为“师傅”，向他们学习怎样在车床上将一个小的柱形零件磨光、抛亮，怎样将一根长条木料刨成四方形，尽管常常干得汗流浃背、手酸指痛，但确实感受到“劳动”两字的分量，体验到工人同志的辛苦。

为了寻找出身苦、作风正派、有政治觉悟的工人作为我们工作队依靠的根子，我在劳动中有意识地接触每一个工人师傅，通过聊天和背靠背地了解情况，参加他们的小组政治学习。周末，还以“访贫问苦”为由，登门访问工人师傅家庭，发动他们揭露厂内问题。但我看得出来，那些工人和干部，似乎人人都提心吊胆，谨慎小心地与我们讲话，干部们见了我们虽然满脸笑容，但也难掩饰他们内心的恐惧，等到召开厂里或车间大会，会场气氛更加紧张，谁都不知道这场“四清”运动会给厂里带来什么，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揪出哪几个“阶级敌人”，打倒哪几个“当权派”。

半年多的“四清”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我学会了木工、车床上的活儿，将组里10多个工人的家庭出身、政治表现、经济情况、生活作风、社会关系摸得一清二楚，都制成“排队”资料，哪一个曾犯过小偷小摸、哪一个曾被人背后议论过有男女关系等都一点不漏地注在“排队”一览表上。经过20多个全体工作队员半年多辛勤工作，确实发现了该厂不少问题，如财务账目不清、干部玩忽职守、公私不分和浪费问题，还有个别领导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和作风问题。还有在工人队伍中查出本人或出身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的“四类”或“五类”家庭的。总之，这个工厂的政治、经济、思想状况和阶级队伍布局已被我们查清。最后，以一份罗列许多数字和问题的大会总结和更换几名领导的决定，宣布该钢铁厂的“四清”运动胜利结束。

1965年春天刚过，我又随冶金局工作队进驻杨浦区某钢铁厂，开始第二期“四清”单位的运动。直到1965年秋末冬初，我回到了市卫生局计划生育办公室，又干起了我的“本行”。

1966年夏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疾风暴雨般席卷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工厂停工，学校停学，机关不办公，许多人戴上红袖章，当上“红卫兵”，参加“造反派”，走上街道游行，呼喊“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上到中央、市委，下到每个基层单位，昔日领导者都成了被揪斗被批判对象。上海乱了，全国乱了，名曰“红色风暴”实为灾难性浩劫，累及面之广、伤及人之深可谓史无前例。



“文革”期间的我

此时，我被市卫生局政治部抽调加入了五人一组的“文革小分队”进驻上海一家市级医学检验所，领导那里的运动。现在想来，那时的我真是个“运动员”，专门为“运动”服务。这家检验所的头头开始还与我们结合一起领导全所革命运动，自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后，我们全都靠了边，被夺了权，我们“文革小分队”一下子由

革命的动力变成革命的对象。在那个时期，人的角色瞬息万变。只记得那时我们五个人被关在小房间里，天天写检查、写批判材料，最后总算过了关。

我回到了机关，结束了“抓革命”，轮到我“促生产”。计划生育办公室的主任、处长这些党员干部全被靠边站，整个市卫生局业务处室归并为一个医疗组，掌管全市卫生工作，我被指派主管全市计划生育工作，包括第一代口服避孕药的研制。跑基层、听汇报、写材料、打报告，大乱之中的业务工作只能以最低要求维持着。有两件事至今印象深刻，记得一次“市革委”（替代上海市政府行使权力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组办全市医疗卫生工作会议，轮到我汇报全市计划生育工作时，在场领导显得十分惊奇，怎么一个看似未婚的姑娘在主持全市计划生育、避孕工作，一位领导问我：“你是哪个系统的，多大了？”“我是市卫生局医疗卫生组的，24 岁。”我涨红了脸，心扑通扑通直跳。还有一件事是有关避孕药研制生产之事。经过临床鉴定，避孕药已进入可生产阶段，但国务院迟迟未发文批准，为此我与信谊药厂、医药公司的两位同志一起去北京国务院有关部门“上访”。那是个寒冬腊月天，我们三人穿了厚厚棉大衣，一下火车就直奔国务院大楼，只见各层楼面空空荡荡，办公室人员三三两两，好不容易找到对口的办公室，却找不到对口的人，在场的人支支吾吾说人都造反去了，无奈之际我们抓住这个留守的人，说明来意，要求快快下文，否则就是对计划生育工作不重视，就是对毛主席提出的计划生育指示不忠。

之后，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全国 27 个省市都被夺了权，实现一片红。市卫生局的革命造反派举起了“打倒老爷卫生局”拳头，我也从医疗组掌管计划生育的位置上停下来，被赶到靠边的机关人员组，当时被称“老爷队伍”。已对计划生育工作产生浓厚兴趣和感情的我难过得哭了起来。

1968 年冬天，我随市卫生局“老爷队伍”来到上海郊县青浦县方家窑下乡劳动，白天下田干农活，晚上我们睡在铺着乱草的水泥地上，一个紧挨着一个，像春卷一样排列，拥挤得半夜起来解手要踩在人身上。由于冬天基本上没什么农活，所以大多数时间是在学习、批判声中度过。那时，出身不好的人每天还要站出来听训话，向毛主席认罪，向革命造反派认罪。我不知道自己属于哪种人，在“罪人”队伍里，我是革命群众，在造反派眼里，我是“老爷卫生局”里的人。

1969 年 9 月，我结婚了，新房设在父母家的后客堂，新房里虽然又暗又潮湿，但有这十几平方米的住房作新房已是令人羡慕的了。新房里挂满了 10 多只毛主席像的镜框，这些都是亲朋好友送的结婚礼，我与做记者的爱人小乔在外滩市革命委员会门口随便照的一张合影成为当时唯一的结婚照。



外滩的留影成了婚照

1970 年春，当时我已身孕 6 月，挺着大肚子，仍随市卫生局的“老爷队伍”去北桥农村劳动改造思想，做农活、扛大粪。常常是深更半夜睡得正浓，毛主席最新指示来了，钻出热烘烘的被窝，冒着风雨、寒霜跟着队伍走在农田堤埂小路上宣传最高指示。是夜伸手不见五指，田埂高低不平又泥泞路滑，我跌跌撞撞，还得不住举手高呼“毛主席万岁”。一不小心要跌倒，会下意识地摸摸肚皮里的孩子，生怕他担惊受怕，但马上爬起跟上队伍。我天性好强，不会开口要别人照顾、帮助。

1970 年 4 月，进驻上海市卫生局的军宣队、工宣队决定解散我们这支“老爷卫生局”队伍。那些有“严重政治思想问题”或有“尚未查清”历史和现行问题的继续去干校学习劳动改造，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多数重新被安排了工作。于是，我这个妊娠 7 个多月快要做妈妈的人，结束了在市卫生局机关工作 8 年的经历，被分配到上海某家胸

科医院做医生。在芸芸众生的大千世界中像一颗飘忽不定的尘埃顿然落地，有了一个真正自我的生存空间。

2. 当妈妈与做医生同时开始

其实，在开始的时候，我曾要求分配到妇产科医院当医生。令人失望的是局属的一家妇产科医院革命造反派不欢迎“老爷卫生局”的人员去那里。几经反复，军宣队小蔡同志最后征求我意见，跟随几位老同志一起去局属胸科医院。

我自学校毕业到机关工作已七八年，脱离临床实践之久，我还能不能当医生，尤其到一个高精尖专业的胸科医院做医生，开始我产生自我怀疑。那天，我爱人来接我下班，一起站在人行道上等公共汽车，他因为人高，本能地站在低于人行道的马路边，我们并肩说着这个话题。“我离开临床已这么多年，如果去胸科医院这样高精尖医院工作恐怕难以胜任”。我担忧地说。

“有什么可怕，一定能行”。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你要知道，我在学校里就喜欢上解剖课，喜欢做外科医生，开刀，但这家医院是做心脏手术、肺部手术，那可不是容易的”。我自己也不知这话是为了说服他，还是希望他来说服我。

“你不做怎么知道行不行”。男人想问题总比女人简单。

如果说，时势将我推向到这一方土地，那么，是我爱人小乔为我的人生道路做了一个根本性选择。

1970 年 4 月的一天，我挺着 7 个月身孕大肚子，走进了坐落于市中心北京西路的胸科医院大门。据说医院前身是一家教会医院，1957 年改为胸科医院。我在进门不远的一幢两层楼的红房子里报到。

人事科的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妇女接待了我，看见我已快生养，就暂时安排我在办公室参加政宣工作，具体事务就是写写稿子，开开座谈会，没有什么压力。倒是走进病房，参加那里的政治学习、小组讨论什么的，总感受到那些医生护士投来的惊异眼光。是呀，我们这些从卫生局下来的新成员已是够引起基层群众的思忖了，更不用说对我，